第 59 卷 第 6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9, No.6
2022 年 11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v. 2022

汉赋文本性质与政教功能成说检讨
——以扬雄《甘泉》《河东》二赋为中心

孙 少 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 对汉赋的文本性质或政教功能,学界向来认同《史记》《汉书》的记载,而结合当时的历史事实与文学状况,汉赋文本皆有其独立的文本性质,甚至隐含着不为史书记载的政治动机。扬雄的《甘泉赋》《河东赋》,《汉书》以为有“风劝”之功能,这就认为其具有特定的政治目的。然深入考察二赋文本,我们会发现二者主要写神仙与祭祀过程,与“风劝”、讽谏、歌功颂德等并无直接关系。由此看来,《史记》《汉书》记载司马相如、扬雄等西汉赋作中的“风谏”“风劝”之论,很有可能是“史臣追书”所致。汉赋的政教功能,其实是在一定历史阶段,被人为纳入《诗经》等经学政教功能、社会功能的轨道,从而遮蔽了汉赋文本的思想原貌。对汉赋文本性质与政教功能的认识,就需要重新予以检讨。

关键词: 文本性质;《甘泉赋》;《河东赋》;风劝;讽谏
中图分类号: I 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22)06-0105-12

长期以来的汉赋文本与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在《史记》《汉书》等相关文献的记载基础上开展的。这是汉赋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本来无可置疑,但正所谓“史之失,自迁、固始”①,《史记》《汉书》强烈的主观书写意识,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史臣追书”②,使得汉赋文本与理论的原貌出现了被“遮蔽”的现象。例如,后世对汉赋文本性质与政教功能的认识,不外乎认为汉赋属于歌功颂德或者对帝王的讽谏、风劝的作品,很少将汉赋文本放在发展、演变的历程中予以考察。若从历史的辩证的角度看,对汉赋的文本性质、政教功能与理论范畴的研究,实际上应该具有一种“批判性”思维,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者需要对汉赋的文本性质与政教功能予以重新的反思与检讨。为研究方便,本文拟以扬雄《甘泉赋》《河东赋》为例,尝试分析这个问题。

扬雄《甘泉》《河东》二赋,本写郊祀,且前者写祭祀泰一、后者写祭祀后土之过程。对于二赋之写作目的,班固《汉书》记载,扬雄“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③;三月,汉成帝“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扬雄则“还,上《河东赋》以劝”④。根据班固的说法,扬雄此二赋分别有“风”“劝”汉成帝之意。这是从汉赋政教或社会功能的角度提出的认识,并且涉及二赋的文本性质及其“风劝”说的起源诸问题。然而,若落实到扬雄二赋的文本实际,其本意是否确实如此,还需进行深入考辨。

一、《甘泉赋》的文本内容与神仙思想

《甘泉赋》是扬雄初入长安时期的作品,表面上看似乎也具有歌功颂德性质,甚至如该赋篇末所言,

收稿日期: 2022-04-30
作者简介: 孙少华,男,山东莱芜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赋文本与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9AZW006)阶段性成果。

① 王益之:《西汉年纪·序》,北京:中华书局 2018 年版,第 1 页。
② 王益之:《西汉年纪》卷一《高祖》,第 3 页。
③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1 册,第 3522 页。
④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5 页。

具有一定的“讽谏”作用。事实是否如此,需要针对赋作进行深入的解读与分析。

扬雄《甘泉赋》《河东赋》主要记录的是汉成帝祭祀甘泉泰一、汾阴后土之神,故《汉书》记载:“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①这里给我们如下信息:第一,扬雄《甘泉赋》撰于初见汉成帝之时;第二,汉成帝祭祀甘泉、汾阴的目的,为“求继嗣”,而此时之皇后,为新立的赵后;第三,扬雄《甘泉赋》无论其本意为何,客观上起到了支持汉成帝、赵后的作用。西汉承周之政统,非常重视祭祀。扬雄逞才,以二赋献汉成帝,实际上一方面博得了汉成帝的赏识,另一方面以待诏身份直接参与到了国家重大事件的讨论中。

既然如此,扬雄《甘泉》《河东》二赋,本质上反映了这两次祭祀活动的过程。此类文献,在《汉书》之《天文志》《礼乐志·郊祀歌十九章》《郊祀志》汉武帝至汉成帝部分,皆有记载,我们将此类文献进行对比分析,可深入了解扬雄二赋问题。

《甘泉赋》自“惟汉十世”至“粲以成章”,实际上写的是祭祀出行前的准备活动。首句“惟汉十世”至“拓迹开统”,是写本次祭祀的政治意义,其他主要写的是“灵旗”与武士:自“于是乃命群僚,历吉日”至“振殷辚而军装”写灵旗;“蚩尤之伦带干将而秉玉戚兮”以下写武士的行动②。

何为“星陈而天行”?颜师古注:“如星之陈,象天之行也。”③或许是画星或天神在旗,武士执之而按照星、神所在方位而行。其中说“八神奔而警跸兮”,“八神”,颜师古注:“自招摇至猖狂,凡八神也。”④如此,八神则指的是招摇、泰阴、钩陈、堪、舆、夔、魖、猖狂,其中前三个为星名。王先谦则认为“八神”当指“八方之神”⑤。这样说或有道理,因为此前,汉成帝已经听从匡衡等人建议,废祀八神⑥。问题是,这仅仅是废祀八神,而各地八神名称不一,故此处所说“八神”,与匡衡所废八神未必相同。再者,即使所废八神相同,仅仅是废祀而已,现实生活的应用中未必完全杜绝八神信仰。

对于招摇以下诸神,《文选》李善注引用了“八方之神”的说法⑦。但综合李善注看,他的观点应该与颜师古一致,皆以“八神”为实指。笔者认为,若画神于旗帜上,则“八神”不应为“八方之神”。此处扬雄当为写实。这里应该写的是扬雄所见祭祀甘泉出行时旗帜上的神祇图像。

本节中的“诏招摇与泰阴兮,伏钩陈使当兵”,与后文“招摇泰壹。举洪颐,树灵旗”文字有出入,但思想相合。前“招摇泰阴”,后“招摇泰壹”,本来一字之差,然后人屡有改字以从文者。如前“泰阴”,萧该《汉书音义》本作“泰壹”,王先谦以为招摇指的是天矛星,泰壹为天帝,不当用“诏”,此处泰阴当据《汉书·天文志》“房为天驷,其阴右骖”与《宋史·天文志》“房南二星为太阳道,北二星为太阴道”“北二星为右骖,次下为右服”之说,当将“诏招摇与太阴”理解为“诏天矛与天驷”⑧。如是,就与后文的“招摇泰壹”产生了矛盾。王先谦引萧该《汉书音义》中如淳的说法,认为“招摇”当作“皋摇”,“皋”即“楔槔”,指的是“积柴于招摇头,致牲玉于其上,举而烧之,欲其近天也,故曰皋摇”⑨。有人理解为烧柴祭天,架起木柴、香草,上摆牺牲玉帛,浇酒、焚烧以享天神;将柴和牺牲玉帛放在桔槔上,点燃以享太一神⑩。但无论如何,招摇、泰一对举,当无问题。

---

①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11册,第3522页。
② 此处文字见《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11册,第3523页。
③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11册,第3523页。
④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11册,第3524页。
⑤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五七《扬雄传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1册,第5322页注8。
⑥ 班固:《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4册,第1258页。
⑦ 萧统编:《文选》卷七,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1页。
⑧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五七《扬雄传上》,第11册,第5321页注6。
⑨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五七《扬雄传上》,第11册,第5336页注2。
⑩ 赵逵夫主编:《历代赋评注(汉代卷)》,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250页。

“招摇泰壹”之后,为“举洪颐,树灵旗”,洪颐,服虔注:“旗名也。”①灵旗,早见于汉武帝时,“为伐南越,告祷泰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泰一锋(旗),命曰‘灵旗’”②。据晋灼与颜师古的说法,所谓灵旗,又名泰一锋旗,即在其上画日、月、龙,又画一星在后(疑即太一星)、三星(太一旁三星)在前③。王先谦以为,此“太一”当作“天一”,因为“太一无三星”④。然《汉书·天文志》载:“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⑤这是说,天极星“其一明者”,为泰一神之所居,其名或为“太一(或泰一、泰壹)”,是以神名作为星名。史书所见“泰一”,或指神名、或指星名。则扬雄《甘泉赋》“招摇泰壹”无误,即在旗上画招摇为洪颐旗,画泰一三星为泰一锋旗(灵旗)。

这样的话,《甘泉赋》“诏招摇与泰阴兮,伏钩陈使当兵”,亦当与灵旗有关,且“泰阴”当为“泰壹”之误。祭祀甘泉泰一神,使用了与泰一神有关的泰一锋旗,这是合理的。

从“于是乘舆乃登夫凤皇兮翳华芝”至“驰阊阖而入凌兢”,写祭祀的车行队伍,主要涉及华美的车饰形状、奔腾的骏马、华丽而繁多的旌旗,还有车行进的声音,人们到达的地点(椽栾,服虔以为即甘泉南山)⑥。此处扬雄多以概括性语言,描写祭祀行程中的物与人。

至此,祭祀队伍到达甘泉南山脚下。接着,自“是时未臻夫甘泉也”至“封峦石关施靡乎延属”,扬雄开始描写遥望甘泉的情景:高耸入云的通天台,平坦宽广的平原,茂盛的芳草嘉树,高陵峻谷,毗连的宫殿,连绵的山峦。这是远观甘泉宫的情景。

自此开始登山,由“于是大夏云谲波诡”至“浮蔑蠓而撇天”,写甘泉宫殿。先写在前殿所见景物:殿庭中的玉树、金人⑦,并用“金人仡仡其承钟虡兮,嵌岩岩其龙鳞,扬光曜之燎烛兮,乘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县圃兮,象泰壹之威神”⑧六句写金人之状貌。最后写通天台之雄伟与神秘。

其后写第二道正门之应门,门前“左欃枪右玄冥兮”,大概是左右旗帜上绘的彗星、水神图案。晋灼曾引《大人赋》文字以释扬雄赋此语,是认为扬雄极写甘泉宫之神仙气息⑨。再次是红色的门楼,以及应门内墙壁上绘的西海、幽都、涌泉与东海蛟龙、昆仑白虎。接着写高光殿、旁皇观之情景⑩:高光殿前殿的壁带、飞檐,以及高光殿两侧、后面的建筑、楼阁,还有帝王与后妃玩乐之璇室、倾宫。

其下“回飙肆其砀骇兮,翍桂椒,郁栘杨”至“虽方征侨与偓佺兮,犹仿佛其若梦”,承上文而来,极写高光殿所见、所感。其中所写桂椒、棠棣、杨树,再加上神秘的香气、袅袅清音,更增仙气浓郁,所以扬雄最后说“虽方征侨与偓佺兮,犹仿佛其若梦”。将此句与本节上文见于司马相如《大人赋》之“左欃枪右玄冥”联系起来,再结合其中所写与神仙有关的水神、彗星、蛟龙、幽都等描写,可知此处扬雄实写甘泉宫,却隐含着对神仙思想的歌颂。这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大人赋》中的神仙思想是一致的。可见,汉成帝求嗣甘泉宫,也有祈求长生不死的神仙思想。班固虽称扬雄此赋有“风”之意,但此赋文本本身却隐含着神仙思想。

本此,《甘泉赋》下一节谈“事变物化”,多与神仙思想有关:汉成帝首先“储精垂思,感动天地,逆釐

---

①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2 页。
② 班固:《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 4 册,第 1231 页。
③ 班固:《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 4 册,第 1232 页。
④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五《郊祀志上》,第 4 册,第 1724 页。
⑤ 班固:《汉书》卷二六《天文志》,第 5 册,第 1274 页。
⑥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25 页。
⑦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27 页;萧统编:《文选》卷七,上册,第 113 页;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五七《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5327 页。
⑧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26 页。
⑨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28 页。
⑩ 萧统编:《文选》卷七,上册,第 113 页。

三神”,然后“函甘棠之惠,挟东征之意,相与齐乎阳灵之宫”。阳灵之宫,颜师古解释为“祭天之处”①。其下“薜荔”“琼枝”及“噏清云之流瑕兮,饮若木之露英”,以及“璇玑”(北斗七星)、“三危”(神话中的西方仙山)②、“东阬”(东海)、“龙渊”、“九垠”(九重)③、“弱水”、“不周”④、“西王母”、“玉女”、“虙妃”⑤,无不与神仙思想有关。其中“屏玉女而却虙妃”,李善注称“以此微谏”⑥,是以为此处扬雄有讽谏意。然此赋其后又有“玉女无所眺其清卢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句,其实此处仿西王母见周穆王事,喻汉成帝独拜西王母以求嗣,与讽谏无关。

于是烧柴祭天,竖起洪颐旗、灵旗,“选巫咸兮叫帝阍,开天庭兮延群神”,又是一番拜神仪式。最后“事毕功弘,回车而归”,过封峦观、棠梨宫⑦,祈福求嗣之事毕。

“乱曰”之后,班固称“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却虙妃’,以微戒齐肃之事”⑧,即认为此赋有“讽谏”之意。笔者以为,班固之言未必符合扬雄《甘泉赋》本意。该赋主旨,应是最后一句“辉光眩耀,隆厥福兮,子子孙孙,长亡极兮”,其中除了求嗣目的,还有求上苍降福于后世子孙之意。这才是“天子异焉”的主要原因。

扬雄《甘泉赋》体现出来的神仙观念,其实能够反映当时汉成帝的思想状况。汉成帝晚年颇好鬼神,其思想渊源即在于此⑨。这一方面与其无嗣有关,另一方面,主要还是与其早期受到的鬼神思想影响有关。当年,汉成帝生于“甲观画堂”,其中即蕴含着一定的鬼神思想⑩。这说明,汉成帝鬼神思想,受其母王政君太后的影响颇深。另外,汉成帝时,谷永进谏,批评“诸背仁义之正道,不遵《五经》之法言,而盛称奇怪鬼神,广崇祭祀之方,求报无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⑪,这从反面证明汉成帝信奉鬼神颇深。匡衡等人的废祀之举,或与此有关。汉成帝在成功恢复甘泉、汾阴祭祀之后,必然是对以往废祀鬼神的反动。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扬雄《甘泉赋》,必然避免不了神仙思想的深刻影响。

二、“不歌而诵谓之赋”:《甘泉》《河东》与郊祀歌之文本关系

纵观《甘泉赋》全文,其实主要与祭祀神仙有关。《河东赋》虽为祭地,但其中很多内容,却在写法、思想内容上与《甘泉赋》有诸多相似之处。这说明,二赋的主要内容,其实都是主要写祭祀神仙之事。因此,二赋之文字、思想,就与《汉书·礼乐志》所录《郊祀歌十九章》有密切联系。

《郊祀歌十九章》中的歌诗,前人多有考证,以为或为祭祀天(甘泉),或为祭祀地(河东),或天地通用。如《练时日》与《华煜煜》二首,或以为二者乃“天地通用之乐也”⑫。《练时日》《华煜煜》,或以为是

①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0、3531 页。
② 萧统编:《文选》卷七,上册,第 114 页。
③ 萧统编:《文选》卷七,上册,第 114 页。
④ 萧统编:《文选》卷七,上册,第 114 页。
⑤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3 页。
⑥ 萧统编:《文选》卷七,上册,第 114 页。
⑦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4 页。
⑧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5 页。
⑨ 班固:《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 4 册,第 1260 页。
⑩ 孙少华:《“九子母”的形象衍化及其文学与文化意蕴》,《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1 期,第 137—147 页。
⑪ 班固:《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 4 册,第 1260 页。
⑫ 朱嘉徵:《汉魏乐府诗集广序》卷二二《汉颂·郊祀乐章》,《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90 册,第 464 页。

祭祀甘泉泰一之“迎神辞”与祭祀河东后土之“祝釐之所通歌”,而与《练时日》篇法“各有其奇”①。无论《练时日》《华熀熀》是否分别为祭祀天(甘泉泰一)、地(汾阴后土)者,二者在迎神、神降等环节上,必然有其相似或相同之处。本此,本文将二歌与《甘泉》《河东》放在一起比较分析。

比较《郊祀歌十九章》之一《练时日》②与十五《华熀熀》③文字,我们会发现《练时日》与《华熀熀》所言神灵事多有意合;扬雄《甘泉赋》《河东赋》中与神灵有关的文字、思想,又与二歌多有相合之处。

《河东赋》前有一段类似于后世“小序”的文字,称“湊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④,与《河东赋》之“乘翠龙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峣崝”、《华熀熀》“沛施祐,汾之阿,扬金光,横泰河,莽若云,增阳波”合。

《甘泉赋》开篇曰:“惟汉十世,将郊上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号,同符三皇,录功五帝,恤胤锡羡,拓迹开统。”⑤此乃祭祀甘泉泰一前颂神之辞。而《河东赋》开篇即曰“伊年暮春,将瘗后土,礼灵祇,谒汾阴于东郊”⑥,其体式与《甘泉赋》同。本文将《甘泉赋》所记汉成帝祭祀甘泉事系于永始四年,则祀汾阴后土亦在是年。

另外,《甘泉赋》“雍神休,尊明号”与“恤胤锡羡”,意思上与《河东赋》“勒崇垂鸿,发祥隤祉,钦若神明者,盛哉铄乎,越不可载已”接近⑦。《练时日》曰“九重开,灵之游,垂惠恩,鸿祜休”,二者皆写祭祀前祷福之事;而《华熀熀》末则曰“遍胪欢,腾天歌”,总结神灵降福、人神皆欢事,其实亦与此所说意近。

《甘泉赋》自“诏招摇与泰阴兮”至“振殷辚而军装”,写行进中的旌旗形状;自“蚩尤之伦带干将而秉玉戚兮”至“半散照烂,粲以成章”,写武士车骑队伍之盛。《河东赋》则曰“于是命群臣,齐法服,整灵舆,乃抚翠凤之驾,六先景之乘,掉奔星之流旃,彏天狼之威弧。张耀日之玄旄,扬左纛,被云梢”⑧。二者正与《练时日》“灵之车,结玄云,驾飞龙,羽旄纷”、《华熀熀》“神之行,旌容容,骑沓沓,般纵纵”意合。

《甘泉赋》“于是乘舆乃登夫凤皇兮翳华芝”以下,尤其是“流星旄以电烛兮”至“超纡谲之清澄”,其实继续写“旌容容,骑沓沓,般纵纵”。这种将现实生活中的祭祀队伍,与《练时日》“灵之车”、《华熀熀》“神之行”结合的写法,将写人与写神相融合,体现了祭祀的神圣性。其后两句“登椽栾而羾天门兮,驰阊阖而入凌兢”⑨,却与《练时日》“九重开,灵之游,垂惠恩,鸿祜休”、《华熀熀》“神之游,过天门,车千乘,敦昆仑”文字、意思皆暗合,如“九重”与“天门”,“羾天门”与“过天门”,“驰阊阖而入凌兢”与“敦昆仑”⑩。另外,赋前文之“方玉车之千乘”与此处之“车千乘”,赋下文之“白虎敦圉乎昆仑”与此处之“敦昆仑”,皆文字合。

此处《河东赋》的写法,与《甘泉赋》非常相似,即继续描写旗帜、车马行状,如“奋电鞭,骖雷辎,鸣洪钟,建五旗”⑪。“奋电鞭,骖雷辎”,形容车马行进疾速,正与《练时日》“灵之下,若风马”合⑫。“建五

---

① 张树国:《楚骚·谶纬·易占与仪式乐歌——西汉诗歌创作形态与〈诗〉学研究》引《乐府正义》《汉诗统笺》《乐府广序》诸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64—265、307 页。

② 班固:《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 4 册,第 1052 页。以下不赘注。

③ 班固:《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 4 册,第 1066 页。

④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6 页。

⑤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23 页。

⑥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6 页。

⑦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6 页。

⑧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6 页。

⑨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24 页。

⑩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25 页注 10。

⑪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6 页。

⑫ “若风马”,颜师古注:“言速疾也。”(班固:《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 4 册,第 1053 页注 6)

旗”,或引《晋书·舆服志》以为“以五牛建旗,车设五牛,青赤在左,黄在中,白黑在右”说①,此说较晚,未必符合西汉时代的事实。结合《练时日》“左仓龙,右白虎”与颜师古“五色之旗”分析,《河东赋》之“五旗”,或者当为五种颜色之旗,其上画有代表不同方位、不同神灵的动物形象。据“左仓龙,右白虎”②,五色旗或者指的是包括苍龙、白虎在内的五种颜色的旗帜。

《甘泉赋》“左欃枪右玄冥兮,前熛阙后应门;阴西海与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蛟龙连蜷于东厓兮,白虎敦圉乎昆仑”③,与《练时日》“灵之下,若风马,左仓龙,右白虎”意近。而《河东赋》“羲和司日,颜伦奉舆,风发飙拂,神腾鬼趡;千乘霆乱,万骑屈桥,嘻嘻旭旭,天地稠嶅。簸丘跳峦,涌渭跃泾”数句④,写车驾与其速度,亦与《练时日》“灵之下,若风马”相合。且《河东赋》自“奋电鞭,骖雷辎”至“涌渭跃泾”,主要写“灵之下”事。

扬雄因回风而感神,有“香芬茀以穷隆兮,击薄栌而将荣。芗呹肸以棍根兮,声駍隐而历钟,排玉户而飏金铺兮,发兰惠与穹穷。惟弸彋其拂汩兮,稍暗暗而靓深”之句⑤,与《华煜煜》“神之出,排玉房,周流杂,拔兰堂”有文字、意思相合之处,如“排玉户”与“排玉房”,“发兰惠”与“拔兰堂”。

神之至,扬雄《甘泉赋》写汉成帝迎神之情景有“逆釐三神者。……噏清云之流瑕兮,饮若木之露英,集乎礼神之囿,登乎颂祇之堂”⑥,与《练时日》“灵之来,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华煜煜》“神之徕,泛翊翊,甘露降,庆云集”意合。其中“逆釐三神”与“灵之来”“神之徕”,“饮若木之露英”与“先以雨”“甘露降”⑦,“噏清云之流瑕兮”与“庆云集”⑧,皆文字相近或相同。

又写神至,《甘泉赋》曰:“神莫莫而扶倾,闶阆阆其寥廓兮,似紫宫之峥嵘。”又曰:“阴阳清浊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调琴。”⑨《华煜煜》则云:“神之揄,临坛宇,九疑宾,夔龙舞。”《甘泉赋》前两句与《华煜煜》“临坛宇”合,后两句与《华煜煜》“夔龙舞”合。另外,《甘泉赋》“傧暗蔼兮降清坛,瑞穰穰兮委如山”⑩,亦合《华煜煜》之“神之揄,临坛宇”。《练时日》则云“灵之至,庆阴阴”,亦与《甘泉赋》此处之“阴阳清浊穆羽相和”相近。

《河东赋》写神,有与《甘泉赋》不同处,其言“秦神下詟,跖魂负沴;河灵矍踢,掌华蹈衰”,“秦神”,《汉书》注引苏林以为“今之茸头是也”⑪;王先谦以为秦神即怒特祠,苏林所言“茸头”当为“旄头”⑫。“跖魂”,颜师古注以为“戚惧之甚也”⑬,王先谦引《说文》“楚人谓跳跃曰跖”,训此句为:“言秦神詟惧其灵魂,跳跃远避而负倚坻岸也。”⑭河灵,苏林曰:“河灵,巨灵也。”颜师古注:“凡言此者,以车骑之众,羽旄之盛,故秦神、河灵莫不恐惧而自放也。”⑮无论如何,此处所言秦神、河灵皆恶怪,言其惊惧之状,与《练时日》“(灵之至,庆阴阴)相放佛,震澹心”相近。

---

①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五七《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5341 页注 8。
② 班固:《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 4 册,第 1053 页。
③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28 页。
④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6 页。
⑤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29 页。
⑥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0—3531 页。
⑦ “露英”,颜师古注:“言其英华之露。”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1 页注 9。
⑧ “瑕”,颜师古注:“瑕谓日旁赤气也。”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1 页注 9。
⑨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28、3529 页。
⑩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2 页。
⑪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7 页注 14。
⑫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五七《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5342 页注 14。
⑬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7 页注 14。
⑭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五七《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5342 页注 14。
⑮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7—3538 页注 15。

由此看出,在《练时日》"灵之至,庆阴阴,相放怫,震澹心"四句上,《甘泉赋》侧重前两句的描写,《河东赋》侧重后两句的描写。

汉成帝坐,默想神至:"风傱傱而扶辖兮,鸾凤纷其御蕤,梁弱水之濎濴兮,蹑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虙妃。"①此正《华煜煜》所言:"神安坐,鴹吉时,共翊翊,合所思。"《练时日》则云:"灵已坐,五音饬,虞至旦,承灵亿。牲茧栗,粢盛香,尊桂酒,宾八乡。"

对此二歌所言,《河东赋》的描写也非常契合,如"遂臻阴宫,穆穆肃肃,蹲蹲如也"②,是总写汉成帝至汾阴之宫,祭祀仪式的庄严、有序。这与上文《练时日》"灵已坐"、《华煜煜》"神安坐"所言是一致的。另外,《练时日》除了写"灵之来",还在"灵已坐""灵安留"中,非常详细描写了这种"穆穆肃肃,蹲蹲如也"细节③:首先是,音乐齐整、众灵闻乐而安坐④;其次,是牺牲、佳肴、美酒,享八方之神⑤;再次,写歌颂四时之乐,遥望玉堂;最后写供神女之乐,佳丽云集,诸神皆欢⑥。

在这一点上,《甘泉赋》《河东赋》与《练时日》《华煜煜》的说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扬雄《河东赋》独无对宴乐场景、美女衣着与美貌的细致描绘。而这一点,在有些汉赋作品中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描写宴乐的场景,又有对美女的描写⑦。这种对音乐、丽人之细致刻画,是汉大赋弘侈巨衍风格的主要体现。素有"文似相如"之称的扬雄,在《河东赋》中涉及宴乐、美女的情况下,不可能回避对其细致的书写。笔者怀疑,这部分与《练时日》对应的文字,很可能在被收录进《汉书》时被人为删除了。

《河东赋》在介绍完祭祀队伍的行进场景之后,并未描写祭祀仪式之过程,而是直接写"灵祇既乡",也就是"既祭,行游介山"之后的事情,《河东赋》对祭祀后土过程一笔带过,直接转入对"灵祇既乡,五位时叙,絪缊玄黄,将绍厥后"的描写,介绍的是汉成帝等人游览介山、华山等地,回忆晋文公、介子推("嗟文公而愍推兮")、禹("勤大禹于龙门")、舜("乐往昔之遗风兮,喜虞氏之所耕")、尧("瞰帝唐之嵩高兮")、西周("眽隆周之大宁")等史事,以及项羽("行睨陔下与彭城")、夏桀("濊南巢之坎坷兮")⑧等历史教训。在叙述完此类史实后,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写渡河赴华山,云雨来迎之事(自"乘翠龙而超河兮"至"廓荡荡其亡双")⑨,其中"云霏霏而来迎兮,泽渗漓而下降,郁萧条其幽蔼兮,滃泛沛以丰隆",与《练时日》"灵之来,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正相合。而《甘泉赋》之"云飞扬兮雨滂沛",亦与此相合。

《甘泉赋》"于胥德兮丽万世"与"辉光眩耀,隆厥福兮,子子孙孙,长亡极兮"⑩,合《华煜煜》所言"神嘉虞,申贰觞,福滂洋,迈延长"。而《练时日》则云:"灵安留,吟青黄,遍观此,眺瑶堂。众嫭并,绰奇丽,颜如荼,兆逐靡。被华文,厕雾縠,曳阿锡,佩珠玉。侠嘉夜,茝兰芳,澹容与,献嘉觞。"三者亦有相合之处。而《甘泉赋》"乱曰":"徕祇效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摇,灵遅迟兮。"与《练时日》"灵安留"亦有相合处。

扬雄《河东赋》最后写"遵逝乎归来",歌颂大汉是以往所有王朝都无法比肩的:"以函夏之大汉兮,

---

①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1 页。
②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8 页。
③ 班固:《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 4 册,第 1052 页。
④ 班固:《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 4 册,第 1053 页注 12、13。
⑤ 班固:《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 4 册,第 1053 页注 14。
⑥ 班固:《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 4 册,第 1053—1054 页注 17、18、19、20。
⑦ 萧统编:《文选》卷八《上林赋》,上册,第 128—129 页。
⑧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9 页。
⑨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8 页。
⑩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3、3534 页。

彼曾何足与比功?”①是以扬雄极言汉德之盛(自“建《乾》《坤》之贞兆兮”至“谁谓路远而不能从”)②。其中“建《乾》《坤》之贞兆兮,将悉总之以群龙。丽钩芒与骖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触。敦众神使式道兮,奋《六经》以摅颂”与《练时日》“练时日,侯有望,焫膋萧,延四方”,《河东赋》“陯于穆之缉熙兮,过《清庙》之雍雍;轶五帝之遐迹兮,蹑三皇之高踪”与《华煜煜》“神嘉虞,申贰觞,福滂洋,迈延长”、《练时日》“垂惠恩,鸿祜休”皆意合。

我们将《甘泉赋》《河东赋》与《郊祀歌十九章》中的两章进行对比,是有学术内在理据的。《汉书·艺文志》列“诗赋略”,“歌诗”类有“《泰一杂甘泉寿宫歌诗》十四篇”,又有“《诸神歌诗》三篇,《送迎灵颂歌诗》三篇”③,凡二十篇,独不录《郊祀歌十九章》。无论《艺文志》中的二十篇歌诗与《郊祀歌十九章》中的十九篇歌诗有无关系、有何关系,其皆入乐当无问题。而《甘泉赋》《河东赋》属于只可吟诵、不可入乐之辞。对于赋而言,正合《艺文志》所言“不歌而诵谓之赋”之说④。如果说,《华煜煜》《练时日》属于祭祀时歌咏的内容,《甘泉赋》《河东赋》则属于祭祀之后的颂神产物。歌诗与汉赋共同的主题,或者是《汉书·艺文志》皆将二者合并为“诗赋略”的原因之一,而这也是我们可以将“赋”与“歌诗”的内容进行对比的学理依据。这一点,对理解“歌诗”与“赋”的定义及二者之关系,不无启示意义。

另外,扬雄《甘泉》《河东》二赋与汉武帝时期《郊祀歌十九章》内容与主旨的相似性,充分说明汉成帝时期的汉赋创作,有上追武帝时期汉赋创作的意图,部分程度上体现了汉成帝有与汉武帝相同或相近的政治抱负与文化追求。这也是扬雄二赋时代意义的最好体现。

三、《甘泉》《河东》二赋文本背后隐藏的政治信息

上文说过,班固以扬雄《甘泉》《河东》二赋为讽谏汉成帝的说法,值得怀疑。起码,对《甘泉赋》《河东赋》而言,其“风劝”主旨不是很明显。总结说来,其原因大略有四:

第一,扬雄作《甘泉》《河东》二赋之时,刚刚被蜀人杨庄推荐待诏⑤,按照一般的人生经验,他应该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抱有一定幻想方符合生活常识。更主要的是,扬雄此时尚不明上意,如何敢有讽谏汉成帝之举?

第二,《汉书》“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⑥,是班固总结扬雄赋论之说,应该是扬雄晚年的认识。此论对于扬雄晚年作品,或者适合,但对于初待诏之扬雄而言,尤其是对扬雄初见汉成帝之作的《甘泉赋》《河东赋》而言,未必适合。

第三,汉成帝郊祀甘泉、后土,明为“以求继嗣”,暗与汉武帝郊祀甘泉、后土之求神仙长生不老有关,故扬雄《甘泉赋》末之“乱曰”方称“辉光眩耀,隆厥福兮。子子孙孙,长亡极兮”⑦。既然如此,初入仕途的扬雄,只有迎合上意,以赋称颂大汉帝德,方能带来“天子异焉”的结果。

第四,祭祀甘泉、河东,是汉成帝支持的结果,并且是政治博弈之后的第一次祭祀活动。在如此敏感的政治时期,扬雄当不至于冒着政治或生命危险,进谏或者讽谏汉成帝。自汉武帝祭祀甘泉泰畤、河东

---

①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9 页。

②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9—3540 页。

③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 6 册,第 1753、1755 页。

④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 6 册,第 1755 页。

⑤ 推荐者为“杨庄”,详考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五七《扬雄传上》引宋祁、李善、钱大昭语以及王先谦本人之按语(第 11 册,第 5319—5320 页)。

⑥ 班固:《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第 11 册,第 3575 页。

⑦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34 页。

后土之后,汉宣帝“修武帝故事”仍之①,汉元帝亦从之,多幸甘泉、河东②。汉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右将军王商、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五十人根据经艺以为应改祭祀甘泉、河东为长安南、北郊祀,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八人以为当从古制③。许嘉即许皇后父,此次争议,最终以许嘉为首的八人失败而告终。此事在建始元年(前 32)十二月④。但在此事之后,建始二年(前 31)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丙午,立皇后许氏”;鸿嘉三年(前 18)“皇后许氏废”;永始元年(前 16)六月,立赵婕妤为后;永始三年(前 14)冬,汉成帝令皇太后下诏恢复在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的祭祀⑤。

值得注意的是,许后被废是废祀甘泉、河东期间的事情;但立赵后不久,汉成帝就很快恢复了重新祭祀甘泉、河东,实际上回到了许嘉等人当初的提议上。汉成帝在甘泉、河东废、复上的态度变化,非常值得令人琢磨。

汉成帝即位之前,许嘉已经“自元帝时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复以元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与嘉并”;“杜钦以为故事后父重于帝舅”,而汉成帝“欲专委任凤”,并以许嘉“不宜以吏职自累”为由⑥,策免了许嘉。这是甘泉、河东废、复之争背后的后党与外戚之争,以及汉成帝在两党矛盾与甘泉、河东废复问题上的政治算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初步判断是,关于甘泉、河东废复,背后有一定的政治博弈。汉成帝本意是支持祭祀甘泉、河东的,所以许嘉、许后、赵后皆支持祭祀甘泉、河东,这实际上反映的是汉成帝本人的意愿。但为了抑制许嘉集团的力量,汉成帝特意选择了违背本意的南北郊祭祀,并拔擢王凤以制衡许嘉,直至最终策免许嘉;在废许后不久,汉成帝马上恢复了祭祀甘泉、河东⑦,正说明了他以祭祀甘泉、河东为借口进行政治斗争的精心设计。

扬雄撰写《甘泉赋》《河东赋》⑧,正是在甘泉、河东废复之争的历史背景中。无论他本人作赋初衷如何,该赋其实起到了支持恢复祭祀甘泉、河东的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初积极鼓动汉成帝废甘泉、河东的五十人中,有王氏家族的人(王商);事后受益者,也是王氏家族之人(王凤、王音),因此,废祀甘泉、河东,背后的推手或者是王太后为首的王氏家族,目的就是为了打压后来成为皇后的许后之父许嘉为首的力量。但赵后被立后,汉成帝迅速“令皇太后诏有司”恢复甘泉、河东的祭祀,这很难说没有赵后一党的作用。《汉书》记载扬雄《甘泉赋》后,称“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⑨,赵昭仪即赵后之妹赵合德,这证明赵后一党支持传统的甘泉泰一祭祀;王氏一党,提倡改祀甘泉、河东为长安南北郊,具有明显的“改革新意”。绥和二年三月,汉成帝薨,尚未下葬,王太后就迫不及待“诏有司复长安南北郊”⑩,可见甘泉、河东与南北郊祭祀之争背后,有非常复杂的政治博弈。所以,本来看似与政治无关的祭祀,背后却是汉王朝不同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王莽篡汉之后,又重新实行了匡衡、王商等人在汉成帝初年提出的祭祀南北郊制度,似乎说明了一点问题。

可以说,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甘泉、河东废复之争的过程中,掺杂着复杂的政治矛盾和斗争。这给祭

① 班固:《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 4 册,第 1249 页。
② 班固:《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 4 册,第 1253 页。
③ 班固:《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 4 册,第 1253—1255 页。
④ 班固:《汉书》卷十《成帝纪》,第 1 册,第 304 页。
⑤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十《成帝纪》,第 1 册,第 445 页;班固:《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 4 册,第 1263 页。
⑥ 班固:《汉书》卷九七下《外戚传下》,第 12 册,第 3974 页。
⑦ 参见《汉书·成帝纪》《郊祀志》《外戚传》等相关记载。
⑧ 扬雄作《甘泉赋》《河东赋》的时间,有永始三年、永始四年、元延元年、元延二年等说(详说见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282—283 页),从赵后被立、汉成帝求嗣的事实看,扬雄作于永始四年的可能性很大。
⑨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5339 页。
⑩ 班固:《汉书》卷十《成帝纪》,第 1 册,第 330 页。

祀甘泉、河东问题蒙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在后党、外戚权力之争中,当许嘉势力占据上风的时候,汉成帝采取了反对许嘉一派祭祀甘泉、河东,支持王氏一派南北郊祭祀的做法;在赵后一党处于弱势的时候,他又采取了反对祭祀南北郊,恢复祭祀甘泉、河东的做法。无论如何,汉成帝在甘泉、河东祭祀废复问题上,有借助这个问题平衡后党、外戚力量的考虑,其实是将祭祀问题政治化了。

由此看出,无论扬雄的本意如何,他在甘泉、河东存废的激烈斗争中进入仕途,因不明政治形势,实际一上来就以《甘泉》《河东》二赋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或政治立场。在扬雄的心里,他当然自认为是为汉成帝而作;但在王氏为首的支持废祀甘泉、河东的人看来,扬雄的政治立场无疑站在后党一方。

对扬雄一生的仕宦遭遇,班固《汉书》"赞曰"有其总结。"赞曰"二字,王先谦以为属于"后人妄增,非班史本文"①。其中"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前人多辨析此说有误,认为此人当为王根②。这似乎是说,扬雄待诏,得到了王氏的支持。事实上,扬雄待诏之后,有上《甘泉赋》《河东赋》之举,虽"与王莽、刘歆并","又与董贤同官",然而却出现了"三世不徙官"的尴尬局面。这充分证明,扬雄并非王氏一党,否则不当有"三世不徙官"之遭遇。

扬雄上《甘泉赋》前,待诏未央宫承明庭,是因为"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③。举荐扬雄之"客",为蜀人杨庄(又作杨壮),时为汉成帝郎。此可知扬雄非王氏、刘向之党。而当初支持废祀甘泉、河东者,主要是王氏一党,另外还有"右将军王商、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五十人"。可见,以王氏外戚为主的一批文人,大多持反对态度。汉成帝薨后,很快废掉了甘泉、汾阴之祀,说明外戚王氏的政治权力一直稳固。如此,起于底层之扬雄,很可能皆未被王氏、后党甚至刘向之流接纳为同党。即使他"文似相如",但"三世不徙官",就成为他的必然命运。

四、从《甘泉》《河东》"风劝"到汉赋"风谏"说之检讨

"风谏(或讽谏)",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其中有"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之语④。这里的"风谏"之辞,似乎出于司马迁之口。然而,如果将此段文字与前述扬雄见汉成帝时作《甘泉》《河东》二赋对比看,有两个地方非常可疑:第一,都是因杨姓蜀人推荐,得以受到皇帝召见;第二,都是甫登场即以赋"风谏"或"风劝"帝王。这是否太巧合了呢?

再看司马相如晚于《子虚上林赋》的《哀二世赋》《大人赋》《长门赋》,本来应该具有更多"风谏"意味,然而一个说"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也"⑤,一个说"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⑥,一个说"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⑦。《大人赋》的"风"义,见于《汉书·扬雄传》之"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⑧,可信度不高。《长门赋》"为文以悟主上",其意近乎"风谏",然此文来历不明,最早见于《文选》,究竟是否还是西汉时期司马相如的本意,不得而知。

《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中,又有"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之说⑨,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此处将司马相如赋,与"《诗》之风谏"

---

①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五七《扬雄传下》,第 11 册,第 5408 页注 1。
② 详考见《汉书补注》卷五七《扬雄传下》,第 11 册,第 5408 页注 4、5411 页注 8。
③ 班固:《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 11 册,第 3522 页。
④ 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9 册,第 3640 页。
⑤ 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 9 册,第 3701 页。
⑥ 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 9 册,第 3711 页。
⑦ 萧统编:《文选》卷一六《长门赋》,上册,第 227 页。
⑧ 班固:《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第 11 册,第 3575 页。
⑨ 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 9 册,第 3722 页。

相联系,显然是认为其赋之“风谏”功能,出于《诗经》。这不太可能是司马迁时代的观点。最为有利的证据就是,“太史公曰”在评论相如赋之后,直接出现了西汉末年扬雄的观点。如果我们认可扬雄话是后人阑入之言,那么,如何保证“风谏”“劝百讽一”不是后人阑入的观点呢?

将《汉书 · 司马相如传》司马相如的评论放在“司马迁称”之下,而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扬雄论赋放在“赞曰”之中,归于班固之言,这部分能够解决《史记》“太史公曰”出现扬雄之言的矛盾,但尚不能解决《史记 · 司马相如列传》中的“风谏”究竟是司马迁之言,还是司马相如本意的问题。

笔者曾经考察过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的文本性质问题,认为“风谏”说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所写其实与《大人赋》一样,皆宣扬神仙不死观念①。如是,《史记》对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风谏”的评价,就存在问题了。

其实,《史记 · 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中所说的司马相如赋“此与《诗》之风谏何异”的观点,与《汉书 · 艺文志》的说法非常接近②。一般认为,这是班固截取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的观点③。其中多将《诗》、赋并举,如“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谕)④,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没其风谕之义”等,是认为赋之“风谕”,义出《诗经》。

“风谕”与“风谏”意同,只不过在汉代,“风谏”更近《诗经》,“风谕”多与诸子辩辞有关。如《史记 · 三王世家》“风喻之”⑤、《史记 · 刘敬叔孙通列传》“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⑥,此二“风谕”,皆与《诗经》无关。至《汉书 · 艺文志》,始将“风谕”与《诗经》挂钩,进而与赋联系起来。这个时间,最早应该在刘向时代。但是,这并不是说,刘向时代之前的汉赋,已经具有了《诗经》“风谕”之义,而是刘向时代的人,开始用《诗经》之“风谕”概括汉赋之义而已。如果将刘向时代总结出来的赋论,去套用在刘向之前所有的赋作上,可能会出现理论与作品、思想与内容的错位。这样看来,《史记 · 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中,将赋与《诗经》“风谏”义相关联的说法,就非常值得怀疑⑦。

刘向之后的扬雄赋作,开始大量出现“风”“劝”之辞,如上文已言“还奏《甘泉赋》以风”“上《河东赋》以劝”,其他还有“聊因《校猎赋》以风”“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⑧。诸如此类,是以为扬雄赋作,已经大量出现“风”之特征。但是也应该清楚,这些总结,大多出于班固的总结,还不是扬雄本人的意见。唯一的一个可能出于扬雄之口者,就是“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云云,是认为赋有“不风则劝”的特点。这一点与扬雄《法言》中的说法极为相似:“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 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⑨《汉书》的说法,大概来源于此。

然而,我们应该明白一点,《法言》“不风则劝”,是扬雄晚年的认识⑩,以其晚年赋论观点作为其早

---

① 孙少华:《“皇权”与“不死”——汉赋早期两大文本主题与“梁园文学”之兴起》,《文史哲》2021 年第 1 期,第 113—124 页。

②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 6 册,第 1755—1756 页。

③ 力之:《〈史记〉引文札记与后世引文问题说略——兼说“刘向明不歌而颂”为以引者所引为引者语》,《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1 期,第 76—82 页。

④ 王念孙以为,“风”下原有“谕”字,今本脱。详见《汉书补注》卷十《艺文志》,第 6 册,第 3024 页注 6。

⑤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王世家》,第 6 册,第 2575 页。

⑥ 司马迁:《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 8 册,第 3293 页。

⑦ 详细论述参见孙少华《“汉赋”确立与汉帝国文化政策的展开》,《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第 95—105 页。

⑧ 班固:《汉书》卷八七《扬雄传》,第 11 册,第 3541、3557、3575 页。

⑨ 汪荣宝:《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版,上册,第 45 页。

⑩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6 页。

年赋作的总特征,是有问题的。故《汉书》中凡以“风”“劝”之辞概括扬雄早年赋作特点的说法,都是值得怀疑的。最起码,我们应该对这种说法进行一番辨析,不能一味盲从《汉书》的说法。如果说,班固《汉书·艺文志》“不歌而颂谓之赋”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首次将赋与《诗经》联系起来;至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与“抑亦雅颂之亚也”之说①,已经明确将赋的地位降在《诗》之后。

由此我们得到如下认识:《史记》《汉书》记载司马相如、扬雄等西汉赋作中的“风谏”“风劝”之论,未必是当时赋作中既有之思想,很有可能是汉赋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后人对此前赋作理论的总结。后世对汉赋“讽谏”功能的认识,其实主要是“史臣追书”所致。在这方面,刘向、刘歆、扬雄、桓谭、班固等人,皆有其贡献。可以说,汉赋的政教功能,尤其是其“讽谏”“风劝”之功能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经学尤其是《诗经》政教功能的影响所致。汉赋产生之后,发展到一定程度,其政教功能即被人为纳入到了《诗经》等经学政教功能、社会功能的轨道,从而遮蔽了汉赋文本的思想原貌。汉赋的原始写作目的与主旨,也就被这种人为赋予的功能遮蔽了。由此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汉赋的“文本性质”,最初或者并无“讽谏”“风劝”等政教功能,亦并无歌功颂德性质,而应该主要是对黄老神仙、长生不老等道家思想的承载与宣传。就此而言,对汉赋文本早期的性质与功能问题,就具有重新检讨之必要。

On the Textual Nature and Political-Civilizing Function of Yang Xiong's *Ganquan Fu* and *Hedong Fu*

Sun Shaohua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As for the textual nature and political-civilizing function of *Han Fu* (汉赋), the academics has generally approved what is recorded in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史记》) and *Chronicles of the Han Dynasty* (《汉书》). However, each piece of *Han Fu* texts had its own independent textual natu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istorical facts and literary conditions at that time, and even implied political motives that were not recorded in historical books. According to *Chronicles of the Han Dynasty* , Yang Xiong´s (扬雄) works like *Ganquan Fu* (甘泉赋) and *Hedong Fu* (河东赋) had the function of euphemistic advice (风劝) , which suggested that they had a specific political goal. However, if we make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two texts above mentioned, we can find that they mainly wrote about the immortals and the sacrificial process, and had no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euphemistic advice, euphemistic remonstrance (讽谏), praises and eulogies (歌功颂德). It seems that the ideas of euphemistic advice (风谏) and euphemistic remonstrance from the works of *Fu* written by Sima Xiangru (司马相如) and Yang Xiong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hich were recorded in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and *Chronicles of the Han Dynasty*, were probably written by later official historians. In fact, the political-civilizing function of *Han Fu* was artificia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track of the political, civilizing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such Confucian classics as *The Book of Songs* (诗经)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which masked the original thought of the texts of *Han Fu*. Therefor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ual nature and political-civilizing function of *Han Fu* texts needs to be re-examined.

Key words: textual nature; *Ganquan Fu* (《甘泉赋》); *Hedong Fu* (《河东赋》); euphemistic advice; euphemistic remonstrance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萧统编:《文选》卷一《两都赋》,上册,第 21 页。